



美国国务院电子期刊
2006年4月

目录

[内容提要](#)

编者

[序言](#)

赖斯国务卿

[美国与世界息息相关](#)

沃尔特·米德，美国对外关系协会基辛格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欧文和艾坦·戈尔茨坦，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研究员

美国二十世纪外交史的主线是在国家利益和理想主义之间寻求平衡

[巴拿马运河：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

运河的建造与移交

[冷战：对美国实力和理想的考验](#)

迈克尔·弗里德曼是《美国参考》撰稿人和外交史专家

随着德国在 1945 年战败以及战争给整个欧洲带来全面破坏，美国和苏联在重建和重组欧洲方面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相互抗争的理念、目标和方案。

[马歇尔计划：行之有效的战略](#)

戴维·埃尔伍德，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史副教授，他也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洛尼亚中心的教授级讲师

"马歇尔计划"最初并不是一项计划，负责该计划的二把手哈伦·克利夫兰称它为"一系列即兴的.....持续不断的国际事件"。但是，这项"欧洲复兴计划"成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史上最成功的举措。

[马歇尔计划：图片集锦](#)

[改变中东均势的苏伊士运河危机](#)

彼得·哈恩，俄亥俄州立大学外交史教授，目前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史学会执行主任

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加剧了阿以敌对关系，几乎引发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决，给英、法两国的称霸野心以致命打击，并为美国确立在该地区的重要政治地位提供了机会。

[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1958 年\)](#)

布鲁塞尔博览会是二次大战后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为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文化冷战拉开了序幕。

[尼克松访问中国：世界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沃伦·科恩，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杰出历史学教授和"总统研究教授"，兼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资深学者

1972 年 2 月，尼克松飞抵北京，与毛泽东举行了一次私人会晤。世界各地电视观众在看到尼克松为宣传色彩浓厚的中国芭蕾舞热烈鼓掌时为之震惊。美中新关系就此开始。

[乒乓外交开创美中关系新纪元](#)

1971 年 4 月 10 日，九名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从香港跨越一座桥梁进入中国大陆，开启了"乒乓外交"的时代。

[贸易和经济：美国外交政策的要素之一](#)

马尔腾·佩雷布姆，马里兰索尔兹伯里大学历史系主任，美国外交关系专家

美国在二十世纪成为世界领袖，它一面继续在国外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一面基于其启蒙传统推广自由、

民主和市场开放的理念，提出“自由贸易的自由国家最终会促进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

冷战之后

沃尔特·拉克，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研究理事会共同主席

冷战于 1989 年以柏林墙的倒塌而宣告结束，东欧各国重新获得独立，苏联最终解体，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和平终于来临。

本期内容提要

本期电子期刊以美国外交政策日程为主题，集中讨论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为审视一个世纪来美国对外关系在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这一建国理想影响下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框架。

如同其他活跃于全球舞台的国家，美国在国际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也受到影响，有时还被迫扮演并非其自身选择的角色。

编者认识到，对“重大事件”的选择终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我们希望本期讨论的重大事件将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美国的性格，促进国际读者之间的对话。

过去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对美国在面临当前各种危机、机会和国际关系的复杂平衡时做出的反应产生了深刻影响。

如同世界上多数国家，对美国而言一个始终存在的政治动力就是要在一个自由、安全与和平的社会中生活，为实现共同繁荣而与盟友和贸易夥伴和谐合作。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又具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独特性，这表现于慷慨助人与自身的利益相结合，在防御性战争结束后执行经济恢复计划，建立各种机制后交由他人管理，并寻求帮助其他国家找到本国走向民主的道路。

美国对外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 Mead)、斯科特·欧文(Scott Erwin)和艾坦·戈德斯坦(Eitan Goldstein)分析了决定过去一百年来美国对外关系演变过程的很多事件和理念，并说明为什么这些事件和理念对今日世界依然有着重大影响。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博洛尼亚中心的戴维·埃尔伍德(David Ellwood)评估了二战后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对西欧经济恢复与重建所发挥的作用。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Baltimore County)的沃伦·科恩(Warren I. Cohen)阐述了尼克松总统 1972 年开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影响与作用。索尔兹伯里大学(Salisbury University)的马尔滕·佩里布姆(Maarten Pereboom)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沃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阐述了 1991 年冷战结束后在全世界寻求适应新的安全环境之时美国履行强国责任的方式。

欢迎您阅读本期电子期刊，分享上述专家和其他专家对美国外交关系中重大事件的思考。

编者

序言

康多莉扎·赖斯，国务卿



在正常时期，当现有的构想、体制和同盟足以应对眼前挑战时，政治艺术的目的是管理和保持既存国际秩序。但在非常时期，当历史的格局发生变化时，政治艺术的使命就成为改造我们的体制和夥伴关系，以便在持久原则的基础上达到新目的。

这样的—个非常时期始于 1945 年，即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之一刚刚结束之时。二次大战彻底摧毁了原有的国际体系。—批美国政治家——包括杜鲁门总统(Harry Truman)、马歇尔国务卿(George C. Marshal, 1947-1949)和艾奇逊国务卿(Dean Acheson, 1949-1953)、范登堡参议员(Arthur Vandenberg)——担当起设计和建造—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责任。

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应对挑战的最佳方案，但当时那些亲历其境的人们却难以做出明确的判断。

1946 年的现实是，德国的重建正在失败，德国人民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日本处于瘫痪境地。1947 年，希腊爆发内战。1948 年，共产党发动政变攫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1949 年，德国被分割，苏联成功地试爆了原子弹，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内战胜利。1950 年，朝鲜半岛爆发了残酷的战争。

这些事件并非民主进程中的战术性失利。随着铁幕在欧洲落下，冷战开始，很难预言自由和开放终将胜利。但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家表现出高超的谋略，成功地制订了原则，组成了同盟，建立了保护自由的体制，抑制了共产主义的传播，最终导致了苏联和华沙条约集团的解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

从 1989 年至 1991 年，我有幸在冷战末期担任白宫苏联问题专家。这是—次难得的机遇，我亲身参与了许多人认为永远不会发生的事件：东欧解放、德国统一、苏联以和平方式解体。—度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件迅速展开，数日之后就演变成不可阻挡的趋势。这正是非常时期的特点。我现在认识到，当时我所做的仅仅是收获 1947 年、1948 年和 1949 年明智决策的果实。

我们邀请读者反思上述变迁以及确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其他至关重要的选择。回顾这些非凡的时刻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今天面临的挑战。

布什总统和我都认为，我们再度处于一个历史上的非常时刻。“9.11”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全球性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寻求通过暴力表达自己的主张，这种意识形态植根于现代中东地区存在的压迫和绝望。因此，我们的应对措施必须广泛而具有前瞻性。我们必须清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即帮助该饱经忧患的地区的人们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国家。

我们知道民主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我们自己的历史就是一个不完美的民族连续几个世纪努力追求崇高民主原则的过程。在我们看到其他国家的人民在进行同样的努力时，我们理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应当相信他们也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正如二战之后那些伟大的设计师们为今天的民主成就打下基础一样，我们目前的决策也将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成功，我们将给后来者留下一个基础，使他们能够建设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一个和平与自由高奏凯歌的世界。

美国与世界息息相关

沃尔特·米德、斯科特·欧文、艾坦·戈尔茨坦
(Walter Russell Mead, Scott Erwin, Eitan Goldstein)

长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明显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色彩仅仅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进程的一部份，具体政策常常必须以冷静的战略目标加以平衡。

沃尔特·米德是对外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亨利·基辛格高级研究员，(Henry A. Kissinger)，斯科特·欧文和艾坦·戈尔茨坦在同一协会担任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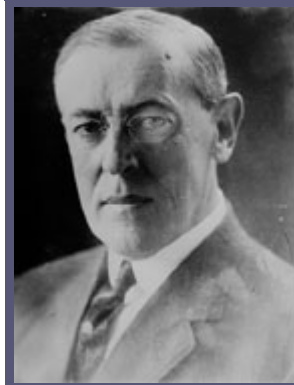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经写道，美国外交政策的决定性特征是在富有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与狭隘的孤立主义之间摇摆。这一人们熟悉的二分法——要么以堂·吉珂德的方式主持正义，要么对世界上的灾难视而不见——堪称简洁明确，但使长期以来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趋势变得模糊不清。关于美国注定要担当传播民主、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的旗手的信念始终是美国与世界交往中的一个因素。诚然，决策者们对推进这些目标的方式或对美国影响这种转变的能力意见不一，但美国各个政治派别的领导人长期以来都认为，此项事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 1913-1921)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 1901-1909)这两位政治上针锋相对的领导人却都认为美国的命运与世界各国的国体和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威尔逊认为，“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是世界事务的参与者……凡是对人类产生影响的事情必定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同样，罗斯福也主张广泛参与全球事务：“的确存在国际道德。身为一个美国人，我竭诚促进自己国家的利益，但同时也尽我所能为整个人类的公正和尊严而奋斗，并因此感到有责任随时对所有其他国家的行为作出评判。”因此，美国外交政策明显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色彩仅仅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进程的一部份，具体政策常常必须以冷静的战略目标加以平衡。罗斯福对这些紧迫的目标和追求这些目标所必须作出的让步作了解释，他告诫说：“为了努力实现崇高的理想，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我们不能一蹴而就的话，那么我们必须一步步迈进，只要我们沿正确方向上真正取得进展，那么我们就应当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满意。”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外交事务，我们可以把它视作理想主义与国家利益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的反映，而不是在孤立主义与参与世界事务之间作出选择。。

因此，美国二十世纪外交史基本上是决策者谋求如何在利益与理想之间求得适当平衡的历史。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最近在谈到这一平衡时说：“美国外交政策始终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特征……并不是盲目追求任何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是在原则和价值观的框架内进行选择。因此，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每天去推行植根于这些价值观的政策，从而使我们得以始终朝某个目标推进……二者之间存在一种联系，即通过日常的政策实施把理想和政策结果联系起来。”将布什政府的做法称为“现实理想主义”的赖斯显然与她的历届前任一样，指出了美国在二十世纪与世界交往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上个世纪中最危急的一些时刻，利益与理想之间的冲突最明显。在这些时候，美国外交政策既具有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色彩又体现了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而且两种特征常常同时展现。

伍德罗·威尔逊这个名字已经成了美国理想主义的代名词。随着此前一贯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建立一个能够保障民主的世界”的决心感染了美国公众。这位曾经担任教授的总统所提倡的独立自主的主张在全球各地民族主义者中引起了深远的反响，威尔逊本人因此被视为类似先知的人物。《华盛顿邮报》一名记者在报导1919年春埃及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时指出，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受到“威尔逊理想的激励”，“在示威时，骚乱的人群呼喊威尔逊的教导”。埃及民族主义者引用威尔逊的信条请求美国参议院支持埃及独立，但威尔逊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重申了美国对英国统治埃及的支持。虽然美国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对自由的支持基本上停留在语言上，但事实证明威尔逊的主张在二十世纪推广民主的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
(美联社环球图片)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
(美联社环球图片)

但是，威尔逊推广民主自由的运动与务实的现实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虽然他谴责土耳其人残酷对待亚美尼亚人，但却因担心危及美国传教团在中东的工作而抵制对土耳其发动战争的强烈要求。确实，由于美国不愿出兵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国家亚美尼亚很快灭亡。威尔逊在战争中的表现也毫无理想主义可言，尽管他坚称“不惜一切代价动用武力”，并威胁要充份发挥美国战争机器的全部威力。因此，基于美国在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的战略是一个狭隘利益取向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原则交互作用的产物。

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甚至更加突出地表明美国的价值观与地缘政治的需要之间的冲突。在日本轰炸珍珠港的前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933-1945)发表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演说。他在演说中宣称，“世界各地”人民有权享有言论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受贫穷困扰的自由和免除恐惧的自由。这些原则后来成为美国参加二次世界大战的口号，为普通美国人提供了参战的意识形态框架。但是，当艺术家诺曼·洛克韦尔(Norman Rockwell)通过在《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所登载的一组绘画作品使这四大自由名垂青史之时，罗斯福却在与专制集权的苏联谈判建立合作夥伴关系。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当时到处是血腥清洗、徒有其名的公开审判和国家政策造成的饥荒，如何在推进罗斯福原则的行动中成为美国的盟友令人费解。

1941年7月，罗斯福派遣深得他信任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远行俄罗斯，对斯大林作为一名战略合作夥伴的承诺程度和可行性进行摸底。霍普金斯指出，与苏联结盟会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困境，他的访问突显了“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分歧”。总统的回应是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而这仅仅是大批援助的开始。罗斯福总统同时授权制作一系列宣传影片在美国放映，影片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好人，为苏联过度使用暴力开脱。罗斯福维持美-苏联盟的愿望使他放弃了支持国外独立自主的长期承诺。乔治·W·布什总统在回顾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因其战略利益而受损时，对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为了稳定而牺牲自由”的外交政策深感失望”。

但罗斯福拥抱苏联并不意味着放弃美国的理想。虽然罗斯福总统与一个残暴的政权结盟，但他也抓住机会，通过建立一个符合美国理想的国际秩序来推广民主和自决。令美国的欧洲盟国懊恼的是，罗斯福自称是帝国主义的敌人并努力将英国人和法国人逐出远离其本土的殖民地。1943年卡萨布兰卡会议(Casablanca Conference)期间，罗斯福在一次晚宴上向摩洛哥的统治者表示他支持摩洛哥独立，而当时丘吉尔正坐在餐桌对面，为英国殖民地的命运发怒和担忧。此外，罗斯福谴责说，英国对西非的统治和法国对印度之那的统治与盟国宣称的战争目的不一致。罗斯福也希望纠正一次世界大战后达成的有问题的协议中的错误。他设想建立一个能够有效确保集体安全和避免全球

性冲突的国际组织。虽然创立联合国的任务后来落在其继任者的身上，但联合国的最初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罗斯福的想法。与一次世界大战相同，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面为推行其价值观作出更广泛的战略承诺，一面与一个专制政权结盟，表现出战术上的灵活性。

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罗斯福 1945 年去世后出人意料地登上总统宝座，这位服装经销商出身的总统随即面临巨大挑战。杜鲁门初次给人的感觉是，他与其温文尔雅、有贵族风度的前任罗斯福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然而，靠死打硬拼而自我奋斗成功的杜鲁门，像罗斯福一样，制订出一项将美国各种利益和理想贯穿于其中的政策。在杜鲁门视察日本城市广岛和长崎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毁灭的同一年，他称赞联合国宪章是“呈献给全能上帝的一份情深义长的感恩大礼”。美国总统对“决心为后世免除战争之祸”的组织表示的由衷支持，与美国对日本进行的“毫不怜悯的战争”形成对照，反映了美国二十世纪外交政策中崇高的理想主义与铁石心肠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鲜明特徵。

杜鲁门也许比美国世纪任何其他的总统都更能够将美国的利益与理念结合为一体。规模庞大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向遭受战争蹂躏的欧洲提供援助，解救了欧洲大陆濒临崩溃的经济，同时阻挡了共产党的推进。该项目以自由企业为重点，因而打破了欧洲的经济壁垒，使经济迅速得到复苏并为欧洲一体化奠定了基础。被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誉为“整个历史上最高尚的行动”的《马歇尔计划》可说是秉承天意，它调和了(尽管并不持久)美国在战略上受到的制约与其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贯穿冷战时期的 40 年里，美国决策者在协调原则与实用性方面鲜有这样的成功，经常是冷静的现实主义占据上风。

苏联的灭亡和自由民主的胜利并未终结美国利益与理念之间的冲突。美国与中国在九十年代的关系证明，这一不可避免的对立依然存在。在老布什政府 1992 年向台湾出售 F-16 型歼击机后，克林顿总统(Bill Clinton, 1993-2001)上任后中美关系处于低潮。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后，对中国实行的制裁和民主党内发出的对中国继续践踏人权的行为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的呼吁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并迫使总统签署 1993 年行政命令，将人权状况与中国最惠国地位的延续联系起来。在有达赖喇嘛和天安门运动领袖柴玲出席的签字仪式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胜利地宣布，“自从近四年前天安门广场事件以来，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愿意为实现积极转变而采取行动的总统。”

这种高尚的理想主义很快成为各种因素的牺牲品，导致克林顿改变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这些因素包括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五角大楼因北韩测试核武器造成迫在眉睫的危机而施加的压力以及与北京之间一系列激烈的公开对抗。克林顿总统认为，可以通过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来最好地推广美国的理想，因此他奉行接触的政策，并于 1994 年 5 月宣布对中国的贸易地位与其人权问题分别处理。财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在解释这一政策变化时说，符合美国利益的做法是“帮助加快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毫无疑问，在人权、宗教自由、安全以及经济问题上，我们与中国有着严重分歧.....问题在于，什么是推进我国利益和信仰的最佳途径。我们认为，接触是在与中国的所有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的最可能行之有效的方式。”1996 年秋，克林顿总统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工作。中国加入这一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此一结果普遍被誉 b 为是克林顿外交政策的最大成就，它再次突显了美国理念与利益之间的冲突。



1944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右)在白宫与副总统哈里·杜鲁门会晤。
(© AP/WWP)



前总统老布什(左)和克林顿总统 2005 年在白宫。
(© 美联社/环球图片)

乔治·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的第二次就职演说表明，美国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理念与利益之间的长期冲突。他宣称“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和我们根深蒂固的信念终于合二为一”，并致力于有效化解相互对立的力量。但美国价值观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冲突并非总是易于解决；尽管总统如是说，但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美国的重要盟国实行的统治往往与美国信念相左。正如过去一样，在忠实于美国理念与关照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之间找到平衡将是美国领导人在整个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核心挑战。

巴拿马运河：

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

1914年8月15日，美国军舰“安肯号”(Ancon)驶经巴拿马地峡(Isthmus of Panama)，从此改变了美洲大陆的面貌，并开创了一条沟通整个世界的重要海上通道。美国历史学家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在他有关巴拿马运河的著作中指出，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的开凿不仅仅是一项空前浩大的工程建树；它还具有与战争相似的重大历史意义，对成千上万不同阶级、不同种族和不同国籍的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开凿运河的最初构想可追溯到16世纪初期。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五世(Charles V)提到开凿运河可缩短从厄瓜多尔到秘鲁之间的旅程。但是，开凿运河的首次尝试直到1880年在以法国为首的联合公司——类似于为开凿苏伊士运河而建立的联合公司——领导下才开始。然而这一尝试以失败告终，后来由美国接替才完工。1902年，美国参议院审议的法案要求在尼加拉瓜而不是在巴拿马开凿运河，但后来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斯普纳(John Spooner)提出的一项修正案赢得参议院的支持。美国众议院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该项立法，并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 1901-1909)签署生效。在与当时控制了巴拿马的哥伦比亚谈判一项协议遇到大量问题后，随着巴拿马政府的独立，美国最终于1904年获得开凿运河的权利。

巴拿马运河工程于1914年竣工。运河长约77公里(48英里)，它包括两个人工湖、数条经过改造的人工航道和三道水闸。另外还有一个人工湖——阿拉胡埃拉湖(Alajuela Lake)——充当该运河的水库。巴拿马运河是国际海运的重要通道，每年驶经运河的船舶超过14000艘，货物吞吐量超过2.03亿公吨。这条呈S形的运河连接太平洋的巴拿马海湾与加勒比海和大西洋。

法国和美国公司先后雇用了超过8万名工人参加这项工程，其中有将近27500人在施工期间死亡，大部份死于疟疾和黄热病这两种热带疾病。基于军医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的发明，人们研制了一种黄热病疫苗，这种疫苗和新的预防药物使这个地区的黄热病得到根除。

巴拿马运河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缩短了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之间的航程。在巴拿马运河修建以前，船舶从纽约到旧金山必须绕道美洲大陆最南端的合恩角(Cape Horn)，距离为22500公里(合14000英里)。而今天，从纽约绕经巴拿马运河至旧金山的航程为9500公里(合6000英里)。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关运河是否应归属巴拿马的谈判于1974年开始，最终达成托里霍斯-卡特条约(Torrijos-Carter Treaty)。卡特总统(Jimmy Carter, 1977-1981)和巴拿马总统托里霍斯(Omar Torrijos)于1977年9月7日签署此条约。运河的移交最终于1999年12月31日完成。

冷战：对美国实力和理想的考验

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J. Friedman)

冷战首先是一场思想交锋，是就人类社会组织原则展开的一场斗争，是自由主义与强加的集体主义之间的一场较量。对美国来说，冷战是它在大国政治中经历的第一次真正持久的冲突；它要求美国人勇敢地面对外部世界。但出于既是利他也是利己的原因，美国人怀着相互矛盾的意愿，即不愿介入冲突而又希望为其他民族的自由提供支持，以致他们在支持自由时并非总是旗帜鲜明。

迈克尔·弗里德曼是《美国参考》撰稿人和外交史专家。

冷战可以说始于1917年，当时俄罗斯出现了致力于在整个工业化世界传播共产主义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对这场革命的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来说，实现这一目标势在必行。他在1918年8月致美国工人的公开信中写道：“不妨说，我们现在似乎处在被包围的堡垒中，等待着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队伍前来营救我们。”

西方政府一般认为，共产主义是一场国际运动，其追随者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而宣布放弃一切对本国本民族的效忠，但他们实际上受命并忠实于莫斯科。

1918年，美国曾一度半心半意地加入企图推翻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协约国集团，但该目的最终未能实现。因此，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苏联与西方之间就存在着怀疑和敌意，只不过反对纳粹德国的需要使双方成为不情愿的盟友。



1962年11月10日，美国海军“巴里”号驱逐舰(Barry)在大西洋上在俄罗斯“安诺索夫”号运输舰(Anosov)旁停下检查货舱。一架美国海军侦察机在上空飞行。苏联舰船运载的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结束时撤出古巴的导弹。
(美联社/环球图片)

[录像剪辑\(英文\)](#)

随着德国在 1945 年战败以及战争给整个欧洲带来全面破坏，美国和苏联在重建和重组欧洲方面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相互抗争的理念、目标和方案。苏联人的行动是基于对意识形态的承诺和地缘政治上的现实主义。无论如何——可以公平地说，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贡献最大，伤亡最多，苏军将东欧和中欧大部份地区从希特勒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人们很快发现，莫斯科要求不仅这些地区的共产党政权而且其他政府也直接向苏联汇报，而完全无视波兰人和捷克人的意愿，更不用说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东欧人。

华盛顿的观点截然不同。美国领导人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政治上孤立于欧洲之外是大错而特错，可能是导致希特勒势力兴起的一个因素，并几乎导致欧洲大陆被控制在一个可能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敌对国手中。现在，在苏军占领了二分之一的欧洲大陆并且共产党在法国、意大利、特别是在德国势力强大的情况下，美国决策人士再次有道理感到忧虑。

两国开始竞相争取得到欧洲及从殖民主义下新独立的国家的忠诚，而一个奉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相对来说不受束缚的国家与一个实行中央计划、政治压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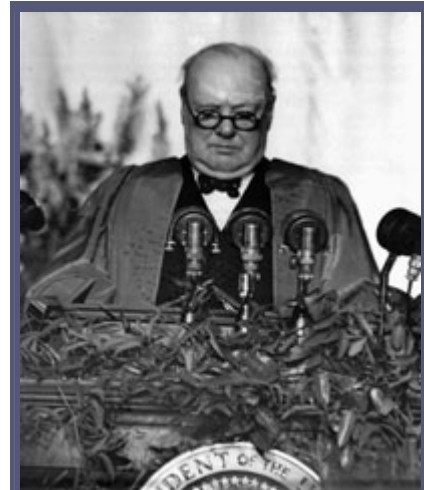
欧洲的冷战

美国将苏维埃的势力"遏制"在战后确定的边界之内的努力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复兴欧洲，从而加强其抵制苏联进一步扩展的能力和意愿；第二阶段，维护美国承诺在核时代保护其欧洲盟国的信誉。

早期的两项行动计划表明了美国重建和保卫非共产主义欧洲的决心。1947 年，英国通知华盛顿说，英国已无力在经济上继续支持希腊和土耳其政府镇压共产党叛乱，杜鲁门总统(Harry S. Truman, 1945-1953)为此争取到 4 亿美元的拨款。更具决定意义的是实行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即美国将提供无限制的承诺，"支持自由人民奋起反抗企图征服他们的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势力"。第二年，《马歇尔计划》为西欧各经济体注入了约 13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1949 年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这是美国首次正式加入 "卷入他国利益之争的同盟"，正式承担起保卫西欧的义务，而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1789-1797)曾告诫不要加入这种同盟。

成立北约是针对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军事优势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执行了有史以来最迅速的军队减员行动。1945 年，其军队为 830 万人，至 1948 年已精简至 50 万人。而苏联红军在欧洲心脏地带保持了大规模驻军，人们普遍认为苏军能够迅速侵占西欧——如果斯大林或他的继任者选择这么做的话。果真如此，美国的军事计划要求用原子弹(后来为核武器)进行反击，但美国的欧洲盟国对此持怀疑态度，这不难理解，因为很多炸弹势必会落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

在苏联研制出原子弹(1949 年)和核武器(1953 年)后，很多欧洲人担心美国是否依然会在苏联发动攻击时为他们提供保护，因为莫斯科可能因此对美国城市发动毁灭性核打击。华盛顿会以纽约为代价来保卫巴黎、伦敦或波恩吗？



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946年3月5日在密苏里富尔顿(Fulton)威斯敏斯特学院(Westminster College)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说"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其中"铁幕"一词给苏联对东欧的影响下了定义。(美联社环球图片)

[录像剪辑\(英文\)](#)

欧洲的冷战围绕的主要是这个问题。西柏林如同被共产主义东德所包围的一个孤岛，因此在军事上无法防御，而苏联则对其施加压力，从而向西欧表明他们随时处于铁拳之下。美国为应对这一压力采取了措施——包括 1948 年的“柏林空运”行动(Berlin Airlift)，由美国空军向这个被苏联围堵的城市空运食品和其他必需品。肯尼迪总统(John F. Kennedy)1963 年作出保证：“所有自由的人，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都是柏林公民(Ich bin ein Berliner)”。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1987 年呼吁：“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道墙”。这一切都表明美国把柏林当作跨大西洋关系的一个重要象征以及美国保卫所有欧洲盟国的决心。

欧洲冷战的最后一次巨大危机表明苏联分裂西方盟国的又一次图谋。1975 年，莫斯科推出 SS-20 型导弹，这种中程武器有较高的精确度，能够击中西欧的目标但不能达至美国。这再次使西欧人产生怀疑：美国是否会在西欧遭受攻击时进行反击从而在苏美之间引发一场相互毁灭的核战争？为恢复均势，北约联盟决心与苏联进行谈判，要求其撤除所有中程武器，并且誓言如果莫斯科不撤除 SS-20 型导弹，北约将部署美国的潘兴 II 型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

很多西欧人反对这些抗衡措施。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和观念，但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在推动组织和煽动这一“和平运动”内的积极分子，希望能够迫使西欧在政治上接受苏联的军事优势。在西德议会于 1983 年 11 月进行投票后，美国开始部署新导弹。

1987 年 12 月，里根总统(1981-1989)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Mikhail Gorbachev, 1985-1991)签署《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Treaty on the Elimination of Intermediate-Range and Shorter-Range Missiles)。苏联未能分裂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是促使冷战结束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冷战时期的“边缘国家”

1947 年，美国外交家凯南(George Kennan)把美国的基本冷战战略阐述为：“遏制政策，其目的是在俄罗斯人有任何迹象侵蚀和平与稳定的世界之利益时，用不可逆转的打击力予以对抗”。在很多情形下，这一政策与华盛顿支持去殖民化以及与新独立的非洲、亚洲和中东国家结盟的真正愿望相冲突，而且后来往往压抑了该愿望。上述地区有时被战略家称为“边缘地区”，而欧洲继续是冷战的中心。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决策者预期衰老的欧洲殖民帝国将瓦解，希望美国能够与这些新兴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美国因此努力阻止荷兰恢复对印度尼西亚的控制，甚至在 1949 年威胁要暂停提供马歇尔计划援助，直到荷兰承认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基于同样的原因，艾森豪威尔总统(Dwight D. Eisenhower)于 1956 年迫使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结束对苏伊士运河和西奈半岛的占领。

但是，美国对“边缘地区”的政策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在有些情况下——如 1986 年的菲律宾——华盛顿站在人民一边，即便这样做意味着与该国亲美的政权对立。在另一些情况下，美国领导人及时看到在民族主义运动后面有共产党人插手，因此把这些国家视为“多米诺骨牌”：如果有一个国家在苏联的影响下“失陷”，其邻国可能会纷纷步其后尘。



1989 年 11 月 10 日，来自东、西德的德国人站在柏林墙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前。此一时刻象征着欧洲冷战终结。
(美联社环球图片)



1991 年莫斯科的一处公园，学童在被推倒的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塑像上休息；这一情景从侧面反映了俄罗斯经历的历史转折。
(美联社环球图片)

正是基于这一“多米诺理论”，美国在干预“边缘地区”时遭遇了最惨重的失败——越南。在日本于 1945 年投降后，法国重新控制越南的努力遇到了顽强的抵抗。美国决策者有心敦促法国撤离印度支那，重演推动荷兰离开印度尼西亚的一幕。但法国领导人警告说，法兰西帝国如遭受这一损失可能导致法国沦为受共产主义控制。华盛顿不愿冒这一风险。从对法国提供支持开始，美国逐步派去培训人员和部队——到 1969 年在越南的美军达近 55 万人，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财富代价，最终并未能阻止北越共产党政权统一整个越南。

虽然冷战期间美国在“边缘地区”的记录并非无可非议，但其对手苏联同样积极地在第三世界到处传播影响，干预地方事务和支持独裁统治者。

长期的较量

遏制战略主张打持久战——它被肯尼迪总统(John Kennedy, 1961-1963)称为“黎明前漫长的斗争”。对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以应对眼前具体挑战为目标的国家来说，这是一项新任务。

美国对早期三次危机的反应表明，冷战不可能以压倒性的军事胜利而结束。杜鲁门总统 1951 年解除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的职务意味着把韩战的目标定为保卫南韩，而不是按麦克阿瑟的愿望去解放北韩。五年之后，当匈牙利人民起来反抗苏联强加给他们的政府和反对镇压他们革命的苏联红军时，艾森豪威尔总统(1953-1961)明显地没有提供实质性支持。

最后，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更加鲜明地确立了核时代直接冲突的界限。苏联试图在古巴秘密部署中程导弹，显然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美国当时在核武方面享有压倒优势，但仍然不愿意接受立即开战可能导致的巨大损失。肯尼迪总统因此与苏联达成一项秘密交易，交易的条款直到很多年以后才被公开。根据此协议，苏联从古巴撤出核导弹，作为交换，美国同意不对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共产党政权发动攻击，并且，在无损于脸面的适当时候，撤回美国部署在土耳其的“陈旧”的导弹。

看来，这两个“超级大国”从古巴导弹危机中吸取了不同的教训。到 1980 年，美国已经基本上推迟进一步增加核武器，而苏联则在大量进行军备建设，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打算放慢步伐。与此同时，苏联 70 年代在非洲冲突中部署古巴武装力量和 1979 年入侵阿富汗——这是苏联首次在东欧以外动用红军——这使很多美国人认为，冷战尚未结束。

冷战结束

今天，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仍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谈两点看法。第一，里根总统下令进行的大规模军备增加了苏联维持其相对军事力量的开支。第二，里根提出的“星际大战”导弹防御体系有可能将竞争转移至新技术的应用，而苏联社会的封闭性使之不适合这方面的竞争。

苏联的计划经济已经显露败像。无论共产主义工业化的模式如何成功，信息技术新时代的出现对严密监视本国公民的社会——甚至使用复印机也受到监督——构成了无以应对的挑战。像戈尔巴乔夫这样富有远见的领导人看到了这一点。在他的领导下开始但最终未能控制的改革导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场长达 40 年之久的冲突代表了意识形态的胜利。美国为赢得胜利付出了代价，而且代价确实巨大。最明显的是，战争带来的无可挽回的巨大生命损失以及在具有不可想象的威力的武器上耗费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本来可用于国内外同样紧迫并且更加崇高的事业。此外还有政治代价，在不同时期冷战迫使美国人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而与可恶的政权结盟。

但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确实取得了成就。最明显的是，西欧以及无疑世界大部份地区幸免于与被打败的希特勒几乎毫无二致的独裁刽子手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蹂躏。同样重要的是，沦陷在苏联统治之下的国家在热核武器时代获得了自由，却没有经历将会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的战争。美国的民主机制保持完好，甚至可以说是蓬勃发展，而美国的社会组织模式——即为个人提供追求理想所必需的政治、宗教和经济自由——在进入新千年之际保持了活力。

马歇尔计划：行之有效的战略

戴维·埃尔伍德(David W. Ellwood)

有关"马歇尔计划"的神话经过演绎传播，获得了与其真正历史遗产同样的威力。1955年，由官方指定研究"马歇尔计划"的历史学家指出，该项目的起源是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哈佛大学一次毕业典礼上讲话时提出的一项"建议"，只有短短一段话，但它"迅速演变成一项规模巨大而富有活力的国际事业：随着这一事业的发展，它对很多不同的人具有很多不同的意义"。五十年后，鉴于"马歇尔计划"享誉之高，对它仍可如此评说。

戴维·埃尔伍德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国际关系史副教授，他也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博洛尼亚中心的教授级讲师。

"马歇尔计划"最初并不是一项计划，据该计划的一些元老说，它从未成为一项计划。负责该计划的二把手哈伦·克利夫兰(Harlan Cleveland)称它为"一系列即兴的.....持续不断的国际事件"。但是，这项"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常常被称为"马歇尔计划"——成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史上最成功的举措。

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垮台以后要求实行"马歇尔计划"。柏林墙倒塌以后，东欧人和俄国人要求实行在1947年把苏联拒之门外的"马歇尔计划"。由于担心非洲解体，英国政府于2005年提议仿照"马歇尔计划"协调国际干预行动。

有关"马歇尔计划"的神话经过演绎传播，获得了与其真正历史遗产同样的威力。1955年，由官方指定研究"马歇尔计划"的历史学家指出，该项目的起源是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哈佛大学一次毕业典礼上讲话时提出的一项"建议"，只有短短一段话，但它"迅速演变成一项规模巨大而富有活力的国际事业：随着这一事业的发展，它对很多不同的人具有很多不同的意义"。五十年后，鉴于"马歇尔计划"享誉之高，对它仍可如此评说。



战后美国第一任国务卿马歇尔肖像(1947年)。他成功地创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欧洲复兴计划。
(美联社/国家肖像馆)

计划的酝酿

当时并存的三种情况是导致美国在 1947 年春制订这项为西欧提供帮助的新计划的动因。首先是战后欧洲大陆在 1946-1947 年冬发生的酷寒造成的恶劣物质条件。第二是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的失败。杜鲁门主义明确表示要帮助希腊和土耳其对抗苏联的压力，但它未能指出向前推进的具有建设意义的途径。第三是国务卿马歇尔在 1947 年 3 月至 4 月为解决德国未来的问题专门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Moscow Conference of Foreign Minister) 期间艰难的经历。



马歇尔计划的策划者 1948 年 11 月在白宫讨论欧洲重建工作的进展(从左至右): 杜鲁门总统、国务卿马歇尔、“马歇尔计划”经济合作署署长、原史蒂倍克汽车公司总裁霍夫曼、也曾经担任企业主管、美国派驻欧洲负责马歇尔计划的代表哈里曼。
(美联社环球图片)

马歇尔在战争结束时作为陆军参谋长从五角大楼退役后，于 1947 年初被哈利·杜鲁门总统(Harry S. Truman)召回，担任国务卿。马歇尔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期间功勋卓著——邱吉尔称他为“胜利的组织者”(“the organizer of victory”)——加上敏锐、诚实和自我克制等个人素质，使他成为这一时期最有威望的人物。他的耐心 and 责任感在莫斯科时经受了最大的考验。美国一位资深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对马歇尔在离开苏联首都时简洁的结语作了概括：“欧洲乱成一团糟。对此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他(马歇尔)如不采取行动，别人就会采取行动。”

凯南和他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室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份总体文件，最后的“马歇尔计划”即出自这份文件。他们的想法部份来自罗斯福时代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起因的理解：阶级仇恨、贫穷、落后和没有改进的希望。这些决策人士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使普通老百姓能够分享工业化成果的战后世界。他们认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人民如果繁荣富足，或者至少是有希望实现繁荣富足，就不会支持集权主义。

凯南和他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室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份总体文件，最后的“马歇尔计划”即出自这份文件。他们的想法部份来自罗斯福时代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起因的理解：阶级仇恨、贫穷、落后和没有改进的希望。这些决策人士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使普通老百姓能够分享工业化成果的战后世界。他们认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人民如果繁荣富足，或者至少是有希望实现繁荣富足，就不会支持集权主义。

但“马歇尔计划”是专门针对欧洲的。凯南、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后来负责“欧洲复兴计划”工作的代表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等人认为，欧洲的魔鬼精灵是民族主义。如果能够利用欧洲经济统一的框架消除产生纳粹法西斯和 20 世纪的其他对抗的根源，那么因此而出现的繁荣可能会缓解民族主义的竞争，防止未来的武装冲突，从而使美国不必介入到未来欧洲战争中去。

于是，现代化与融合成了“欧洲复兴计划”的双重目标，而争论的焦点转为如何实现这两个目标。在“马歇尔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欧洲人应当在这一构想内自己思考和行动：正因如此，该计划才不单纯是又一项援助计划。

马歇尔 1947 年 6 月在哈佛大学发表的简短而看似简单的讲话首先阐述了欧洲面临的灾难和无望。他然后警告那些企图利用人们的痛苦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人。他明确表示，美国的援助不会把意识形态作为条件；也就是说，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不会因其为共产党国家而失去参加“马歇尔计划”的资格。

最后是马歇尔讲话的要点。他在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语中，请欧洲人就他们的需要以及他们在美国介入时所能采取的行动达成共识。马歇尔说，美国的作用“应当包括在制订一个欧洲项目时提供友好协助，并在以后有实际可能时为这样的项目提供援助”。国务卿马歇尔坚持认为，欧洲人必须联合行动，并且必须寻求“治本而不是治标”。他在结束讲话时敦促他的美国同胞们“正视历史明确赋予我们的巨大责任”。

一位美国记者写道：“我们本来指望他们跳两英寸远，结果他们跳了六英尺。”不到两个星期，法国和英国外交部长在巴黎启动了欧洲经济合作会议(Conference on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会议从6月底至9月底分阶段举行；在另外14个国家政府的协助下，会议就他们认为他们所需的全部经济援助为(美国)国务院准备了一份报告。大多数与会者所代表的国家没有一项全国性计划，有些甚至没有一份对其总体经济状况的描述。在对整个欧洲大陆联合进行规划毫无经验的情况下，与会代表们拟出总额为280亿美元的预算。这一数字立即被华盛顿否决，理由是数目过大，无法承受。

但最令欧洲经济合作会议出名的是由克林姆林宫外交部长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率领的庞大苏联代表团与会后(巴黎会议)迅即离席而去的事件。面对西方有关联合制订和实施将德国作为一个统一经济体的全欧洲复兴提案，苏联代表拂袖而去。这是华盛顿已经预料到的。苏联代表团谴责美国及其重要盟国企图控制欧洲各经济体，并将这项努力视作美国强权帝国主义披上的新外衣。莫斯科给东欧国家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他们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煽动下发动政变，终于导致二次世界大战盟国之间的分裂。

计划启动

经历了一个漫长冬季的讨论和提供一些临时性帮助后，在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之际，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会法案，“欧洲复兴计划”正式产生。美国还新成立了一个称为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的联邦机构，负责管理此项计划。为了表明他希望获得两党对该计划的支持，民主党总统杜鲁门任命共和党人、史蒂倍克汽车公司(Studebaker)首席执行官霍夫曼(Paul G. Hoffmann)为该署署长。国会在严格监督的同时开始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

计划确立时提出的首要目标是，截至1952年在西欧建立起“健康、不依赖大量外援的独立经济”。经济历史学家韦克斯勒(Immanuel Wexler)写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案规定，复兴计划必须建立在四项具体努力的基础之上：(一)努力发展生产；(二)扩大对外贸易；(三)实现并保持国内财政稳定；(四)发展(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很多欧洲人原以为他们可以获得一项大规模援助计划，但结果令他们感到失望。他们很快认识到，只有通过永久地改变欧洲经济——单一经济和总体经济——的结构才能实现上述目标。而这正是马歇尔“治本而不治标”的原意。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欧洲经济合作会议很快演变成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由比利时总理斯巴克(Paul-Henri Spaak)担任主席。与此同时，美国驻每个参与国的大使馆与所在国纷纷签署了双边协议，协议明确规定了欧洲各国政府对新的经济援助机构所承担的义务，其中包括同意该机构有权在每个国家首都设立经济合作署代表处，并成立正式委员会，沟通每个代表处与参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以便监督项目的实施。

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是制订有效使用新的“对等基金”(Counterpart Fund)的计划。这是整项工程最具特征的一点，是使“马歇尔计划”有别于其他传统援助项目的工具。这项基金是专为接受“欧洲复兴计划”提供的物资在当地销售所得的利润而在每个国家银行开设的帐户。大部份的援助物资不象欧洲人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免费或可以变为现金，而是从美国运来销售给报价最高的公家或私人的商品。销售这些商品所得的资金不是回到美国人手中，而是被存入新的基金，用于支付重建和现代化建设的项目。这些项目由经济合作署代表处和各个参与复兴计划的国家共同决定。

同时，经济合作署显然是冷战时期一项强有力的武器。驻欧洲高级代表哈里曼大使1949年甚至把整个复兴努力称作“救火行动”。接替马歇尔担任国务卿的艾奇逊回顾说，“民众和国会议员最终希望了解的是，马歇尔援助计划如何遏制了苏联势力的扩大以及如何防止了人们接受共产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并与之结盟”。艾奇逊曾说，他是就“马歇尔计划”演讲和回答问题最多的人。

向受益者宣传"欧洲复兴计划"

与"欧洲复兴计划"针锋相对的是克林姆林宫为了对抗"马歇尔计划"而于 1947 年 10 月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其任务是协调苏联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的政治努力和指导各个参与国内部的宣传工作。当时，共产党势力领导着希腊的武装叛乱，似乎有能力在意大利夺取政权，看来会给法国带来混乱，并有针对德国的具体行动计划——而此时的西方却毫无作为，是冷战为"马歇尔计划"提供了紧迫感和凝聚力。

另外，经济合作署规划人员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克服可能出现的政治障碍需要越过地方执政阶层而直接向欧洲公众传达信息。一批新闻记者和电影制作人发起了"欧洲复兴计划信息项目"(ERP Information Program)，经过紧张的努力，到 1949 年底，把该项目变成了一个在和平时期由一个国家针对多个国家的规模最大的宣传活动。

"马歇尔计划"的演变

在所有参与者的记忆中，"马歇尔计划"的早期阶段(从 1948 年至 1950 年 6 月韩战伊始)是经济行动和回报的黄金时代。专家们提到，在 1947 年至 1949 年间，参加"欧洲复兴计划"的国家的商品和服务总产出增加了近四分之一。他们宣称，"以 1938 年作为比较基准的综合生产指数至 1949 年上升为 115，而 1946 年和 1947 年的综合指数分别为 77 和 87。"农业也得到了恢复，而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的进展则被认为是"不平稳但肯定是令人鼓舞"的。成员国外贸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它最引入注目的一个特点是出口方向的改变。出口对象不再局限于老牌的欧洲帝国，而是在西欧的"欧洲复兴计划"成员国之间增长最快。历史表明，这是欧洲大陆经济长期的结构性转变，将在几年内增强欧洲政治融合的需要。

与此同时，参与国关于"欧洲复兴计划"的设想与美国策划者的设想在某些重要方面的显著分歧到 1949 年底已经显而易见。西欧政府急需"欧洲复兴计划"提供的资金，但它们同时努力想避免永远依赖美国，并在更高层次上希望美国提供援助的条件能够更有助于实现它们自己的政治目的。

英国费了很大力气抵制"马歇尔计划"关于立即与欧洲其他国家在经济上融合的要求，而这是各国接受马歇尔援助必须满足的条件。荷兰人抵制以自由贸易的名义要求他们开始解散其帝国的压力。澳大利亚人直截了当地拒绝按照美国人的意愿改造澳大利亚的铁路和银行系统。希腊人拒绝采用"欧洲复兴计划"支持的货币，因为他们认为以黄金为支撑的本国货币是唯一可靠的交换手段。意大利工业界领袖告诉驻罗马代表处说，不管合成纤维有多便宜，意大利妇女都只会选择本国用天然材料缝制的服装。他说，罐装食品可能价格便宜，但人们更喜欢的是意大利的传统烹调；和过去一样，未来小公司和传统手工艺人的手艺对意大利依然非常重要。

到 1950 年初，实际经验和广泛的民意调查使人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显著转变。"马歇尔计划"的策划者不得不认识到，欧洲人往往更倾向于没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社会福利国家，而不是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这些策划者因此将重点放在欧美有着相当共识的领域：安全。"马歇尔计划"的主管人员开始只要求各国平等分享"欧洲复兴计划"的益处，因为他们现在的目标不再是改组欧洲，而是采取挖墙角的手段反击共产党对复兴计划和以福利为基础的社会民主改革思想的攻击。

韩战的影响

1950 年亚洲事件令人意外和恐惧的突变很快给"马歇尔计划"自身的存在划上了问号。北韩六月入侵韩国，使冷战对抗进一步激化，缩短了该计划实施的时间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内容，马歇尔援助被部份用作让西欧以"共同安全"("Mutual Security")名义增强军备的手段。国会在 1950 年和 1951 年通过的《欧洲复兴计划法案》修正案另外提供 4 亿美元，本意在于继续说服欧洲雇主和工人"接受美国对生产力的社会和经济功效所作的定义"，而现在则用于帮助西欧在增加消费品生产

的同时增加防卫苏联威胁的国防军工生产。各国都应为这一总体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以加强北约), 并因此重建自己国家自二次大战以来大大削弱的武装力量。经济合作署工作组很快认定, 美国对普遍加强军备的要求和原来的"欧洲复兴计划"目标之间没有冲突, 只需要根据新的要求调整现行政策目标。

在此背景下, "欧洲复兴计划信息项目"的成功实施迅速演变为一场"心理战", 产业和工会被确定为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冷战的关键前沿阵地。正如经济合作署最有影响力的智囊人士、助理署长(后来担任代理署长) 比塞尔(Richard M. Bissell)在美国主要的国际关系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51年4月刊中阐述说, 美国能够凭借其经济榜样和消费者经济对欧洲所有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强大吸引力而在欧洲最有效地进行这场战争:

可口可乐和好莱坞电影可以被看作是肤浅和粗糙的文明的两个产物。但美国的机器设备、美国的劳工关系和美国的管理和工程在各地都受到推崇.....[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场和平革命, 这可以将我国某些已经确立和令人向往的特徵——从高生产率到 [劳资]集体谈判等——融入欧洲经济体制.....这将要求社会态度发生深刻的转变, 使之与二十世纪中期协调合拍。

成果与影响

最后, 各个参与国都成功地完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比尔斯和平革命。在经济上, "马歇尔计划"对希腊、法国、奥地利和荷兰远比对爱尔兰、挪威或比利时更重要。对像意大利等国来说, "马歇尔计划"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大概只限于一年; 但另一些国家则连续数年受益。

每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利用"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经济刺激。丹麦人获得原材料和能源。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民——如德国占领区人民——最需要的是计划提供的食品。意大利和希腊在重建铁路、道路和电力供应等方面得到的援助带来了最持久的惠益。在法国, 工业投资受益最大; 在英国, 对等基金(Counterpart Fund)几乎全部被用来支付战时所欠的债务和使英镑恢复浮动汇率。

奥地利和瑞典两国各自认为, 它们成功地融入西方阵营始于"马歇尔计划"。虽然共产党继续在意大利和法国发展, 它们至少未能掌权, 随着冷战的深化, 这些国家继续倾向于西方。也许受益最大的是德国, 因为"欧洲复兴计划"所构想和促成的生机勃勃的欧洲一体化运动使这个新的联邦共和国能够日益壮大和受到尊敬, 同时使其邻国打消了疑虑。人们所期待的法德关系上的突破确实发生了。无论存在何种冷战的短期需要, 没有任何一项政治变化比法德结盟更加突显出与一次大战后的区别。

回顾起 50 年前的经历, 负责希腊"马歇尔计划"工作的沃伦 (Jim Warren)仍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我们目标明确; 我们充满激情; 我们拼命工作; 我们缜密思考, 我们能够规划项目, 努力奋进, 看到成果。

在短短的时间里, 美国寻求通过在欧洲的积极活动将美国在经济上的成功经验变成在政治上拯救其他国家的良方。当时, 心怀感激的欧洲人说, 这些美国人给欧洲带来"希望和信心", 使欧洲大陆"恢复了勇气和精力"。

在欧洲, 外来模式和本土模式之间的冲突推动了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繁荣。"欧洲复兴计划"引发了连锁反应。1957 年签订了《罗马协定》(Treaty of Rome), 根据该协定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虽然该整合新兴欧洲经济的计划远远不如美国规划人员在 1949 年所要求的那样大胆, 但在"马歇尔计划"及其承诺所带来的成果中, 没有任何一项比它更加具体实在。这一奠基性文件使欧洲开始走上和平的经济融合的道路, 该进程到今天仍在继续。

至于美国人，在一次大战后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蹒跚起步后，他们现在最终制定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和恢弘的战略。蔚拉·迪恩(Vera Micheles Dean)1950年在《欧洲与美国》(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指出，这一战略"与他们[美国人]作为20世纪最大的债权人、最大的生产商和最大的消费者新担负的责任是一致的。"他们还赋予自身一个新的国家形像，即美国作为一个大国能够成功地在国际舞台上集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导力于一身，每当任何国家摆脱战争和痛苦，向一个崭新、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迈进时，这一形像注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改变中东均势的苏伊士运河危机

彼得·哈恩(Peter L. Hahn)

今年是苏伊士运河危机(Suez Crisis)五十周年。五十年前，以埃及为一方、以色列、英国和法国为另一方的一场战争几乎导致卷入苏联和美国的更大规模区域性战争。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Dwight D. Eisenhower)坚定不移地使用外交手段，因而避免了冲突升级。这场危机影响了中东地区的力量均势。

彼得·哈恩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外交史教授，目前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史学会(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执行主任。他专门研究1940年以来的美国中东外交史。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一次起因纷繁、对中东地区国际史有着重大影响的错综复杂的事件。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席卷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以及20世纪中叶波及全球的非殖民化浪潮——那次浪潮引发了殖民主义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冲突。危机加深了阿以敌对关系，几乎引发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决，给英、法两国的称霸野心以致命打击，并为美国确立在该地区的重要政治地位提供了机会。

冲突的起源

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起源错综复杂。危机前，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停战协议，结束了两国1948-1949年的敌对冲突，但严格来讲仍处于战争状态。联合国和其他国家为使两国达成最后和平协议所作的努力——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在1954-1955年间努力推行的所谓Alpha和平方案——未能奏效。在这样的紧张局势下，1955年8月和1956年4月在埃及-以色列边界沿线发生的暴力冲突几乎导致全面战争的爆发。在埃及于1955年底购买苏联武器之后，以色列内部出现日益高涨的压力，要求在埃及尚未熟练使用苏联武器前予以先发制人的打击，以瓦解埃及总理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的权力基础和解除埃及的军事能力。

与此同时，英、法两国因纳赛尔再三挑战其在地中海盆地的帝国利益而感到难以容忍。英国把纳赛尔发起的将英国军队赶出埃及的运动——1954年签订的条约实现了这一目标——视为对其威望和军事能力的打击。纳赛尔企图将自己的影响扩大到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做法使英国人确信纳赛尔企图消除英国在该地区的势力。法国政府则对纳赛尔支持阿尔及利亚反叛分子摆脱法国争取独立的活动颇为不满。至1956年初，美、英两国官员就代号为Omega的绝密政策达成一致，即通过各种微妙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孤立和制约纳赛尔。

苏伊士运河危机于1956年7月爆发。为了表明他一心摆脱殖民统治的立场，对英美拒绝提供经济援助进行报复，攫取苏伊士运河公司在埃及赚取的利润，纳赛尔将这家由英国人和法国人控制的公司收归国有，从而引发了一场历时四个月的国际危机。在这场危机中，英国和法国逐渐在该地区部署了大批兵力，并警告纳赛尔，如果他仍坚持到底，两国将动用武力恢复对运河公司的所有权。英、法官员私下希望施加这样的压力会在动用武力或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最终导致纳赛尔下台。



美国的回应

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从下面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来处理危机的。首先，虽然他同情英、法两国收复运河公司的愿望，但只要埃及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向英、法)提供充份赔偿，他对埃及接管运河公司的权利没有异议。艾森豪威尔因此力求避免军事冲突，在苏联利用这一局势来谋取政治利益前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运河争端。他指示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采取向公众发布声明、展开谈判、在伦敦举行两次国际会议、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者协会(Suez Canal Users Association)以及在联合国进行商讨等措施，以英国和法国能够接受的方式缓解危机。但是到10月底，这些努力都未能奏效，英法两国的备战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第二，艾森豪威尔尽力避免疏远阿拉伯民族主义人士，因此他在为结束危机而展开的外交工作中将阿拉伯政治家包括在内，同时拒绝支持英、法军队对埃及动武，部份原因是纳赛尔接管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行动受到埃及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普遍赞赏。确实，纳赛尔在阿拉伯国家中声望大增，从而阻碍了艾森豪威尔与阿拉伯领导人合作解决运河危机的努力。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领导人拒绝了美国要求其批评纳赛尔的行动或挑战其威望的提议。

第三，艾森豪威尔担心，以色列-埃及和英法-埃及之间冲突的相互交织会引发中东的动荡，因此他试图阻止以色列卷入苏伊士运河的争端。为此，杜勒斯拒绝让以色列在为解决危机而召开的外交会议上发表意见，并阻止在联合国会议期间讨论以色列对埃及政策提出的申诉。到八月和九月间，艾森豪威尔觉察到以色列企图将对埃及的敌对行动升级，他因此安排从美国、法国和加拿大运输有限的军备，希望借此缓和以色列不安全的局势，从而避免埃-以战争的爆发。

冲突爆发

10月，危机出现了新的、出乎美国意料的转折。法国、英国和以色列共同秘密策划，协调对埃及发动战争。对此美国全然不知。按照这项协议，以色列先进入西奈半岛，然后英法两国发出最后通牒，下令埃及和以色列军队撤出苏伊士河地区。如果纳赛尔拒不服从(正如他们所料)，那么英法两国就会在48个小时内轰炸埃及机场，占领运河区和废黜纳赛尔。美国官员没有预料到这一密谋，部份是因为以色列和约旦之间可能爆发战争的威胁以及匈牙利境内的反苏浪潮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部份是因为他们忙于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另外还因为他们在参与密谋的政府内的朋友否认此事——他们保证说不会发动进攻，而美国相信了这些话。然而，就在10月29日，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对埃及军队发动了正面攻击，此后以军在数天之内接近苏伊士运河。

对战争的爆发感到突如其来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为尽快结束战争采取了一系列步骤。艾森豪威尔对伦敦和巴黎的盟友共同密谋欺骗他感到愤怒，同时还担心战争会使阿拉伯国家投向苏联的怀抱。就在英法两国的战机轰炸埃及目标之际，为了制止战争，艾森豪威尔对参加密谋的国家实施制裁，促使联合国通过了停火决议和建立联合国紧急部队(United Nations Emergency Force)，以使交战各方的军队脱离接触。但在联合国紧急部队得以部署之前，英国和法国的伞兵于11月5日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登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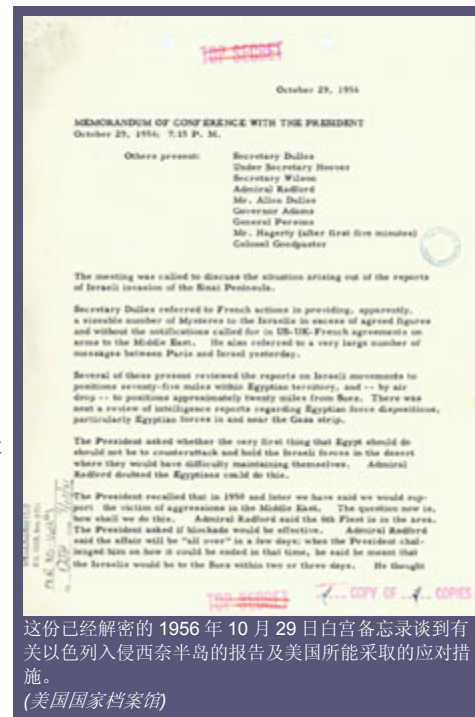
英法两国登陆的行动将危机推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苏联为了转移人们对匈牙利革命运动遭到残暴镇压的注意力，威胁要干预冲突，甚至要动用核武器攻击伦敦和巴黎，以此报复。有关苏联军队正在叙利亚集结，准备在埃及采取干预行动的情报令美国官员担忧，他们认为，匈牙利的动荡局势使苏联领导人易于采取鲁莽行动。艾森豪威尔慎重地通知五角大楼做好打仗的准备。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和摆脱殖民统治的斗争相互交织，从而引发了东西方之间具有重大影响的对抗。

面对突如其来的发生全球冲突的可能性，艾森豪威尔在感到震惊之余迅速采取避免战争的行动。他对交战国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要其在11月6日接受后来于第二天生效的一项联合停火协议，并支持联合国官员向埃及紧急部署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努力。结果，紧张局势逐渐平息，英法两国部队于12月撤离埃及。在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谈判后，以色列军队于1957年3月撤离西奈半岛。

危机的后果

虽然苏伊士运河危机很快得到缓解，但它对中东地区的力量均势和美国在该地区承担的责任产生了深远影响。危机极大地损害了英国和法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威望，从而削弱了欧洲列强在该地区的传统权威。与此相反，纳赛尔不仅安然度过这场危机，而且由于他敢于反抗欧洲帝国并抵抗了以色列的军事入侵，从而在阿拉伯各国人民中确立了他作为一位领导人的新威望。该地区残存的亲西方政权在纳赛尔领导的反帝斗争浪潮下似乎难以维持。虽然纳赛尔没有立即表现出可能成为苏联附庸的倾向，但美国官员担心苏联对欧洲盟国的威胁提高了它在阿拉伯国家的威望。推动阿-以和平进程的可能性在可预见的未来似乎等于零。

为了应对苏伊士战争的这些后果，总统于1957年初宣布实行一项重大的地区安全新政策，即所谓的艾森豪威尔主义(Eisenhower Doctrine)。这项于一月份提出、三月获得国会通过的计划承诺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遏制共产党在中东地区的发展。为了实施这项计划，总



统特使理查兹(James P. Richards)前往该地区，为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和利比亚提供了数千万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虽然艾森豪威尔主义从未正式启动，但它在以下三项具有争议的行动中为美国政策提供了指南。1957年春，总统下令向约旦提供经济援助，并派遣美国舰队到地中海东部帮助侯赛因国王镇压亲埃及军官发动的叛乱。1957年末，艾森豪威尔敦促土耳其和其他友好国家考虑入侵叙利亚，以阻止叙利亚的激进政权巩固其权力。1958年7月当巴格达爆发暴力革命并有可能在黎巴嫩和约旦点燃骚乱烽火时，艾森豪威尔下令美军占领贝鲁特，并将物资运送到占领约旦的英军手中。这些美国对阿拉伯政策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清楚显露出艾森豪威尔把维护西方在中东的利益视为己任的决心。

苏伊士运河危机是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通过改变西方关于英、法的中东霸权的传统认识，激化纳赛尔所代表的民族主义革命问题，引发阿-以冲突，并可能给苏联进入这个地区提供借口，苏伊士运河危机为美国广泛、深入和持久参与中东事务起到了助推作用。

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1958 年)

冷战时期最著名的国际博览会也许是 1958 年在比利时首都举办的布鲁塞尔国际博览会(1958 Exposition Universelle et Internationale de Bruxelles)。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博览会，因此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同盟国——法国和英国——利用这一机会来展示战后获得的成就，而轴心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则借此机会重新塑造自己的国际形像。然而，在这次充满喜庆的盛会上最引入注目的却是美国与苏联之间明显的紧张关系，两国各自利用自己的展出宣传相互敌对的政治体系。

美国的展览以“未竟事业”(Unfinished Business)为题，涉及多个方面，其中包括种族隔离等美国社会问题。这冒犯了南方的国会议员，他们因此撤消了美国参加博览会的预算中尚未使用的资金。结果，美国的科学展被压缩，俄罗斯于是有效利用了美国在国际科学展厅未利用的展位大力宣传苏联的技术进步：例如，它展示了苏联如何和平利用原子能，将此与美国利用核能“毁灭人类”进行对比。

苏联展览的压轴戏是它新发射的“伴侣号”人造卫星(Sputnik)模型；苏联通过在一年前发射这颗卫星已经展开其航天项目，其中包括载有一条名叫“莱伊卡”(Laika)的狗的航天飞行。虽然美国此时已经成功地发射了自己的“探险者号”(Explorer)人造卫星，但它未在博览会上展出这一航天成就。苏联展出的人造卫星最为轰动，苏联利用其展品向游客说明，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更为先进的苏联将很快在物质生产方面超越美国。美国在后来的世界博览会中作了较为充份的准备。



在 1958 年比利时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由沃特金(Andre Waterkeyn)设计的原子球。其结构为放大 1650 亿倍的铁晶体。这座已有 48 年历史的标志性建筑最近进行了全面的修复。这次世博会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为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文化冷战拉开了序幕。
(美联社环球图片)

除了冷战时期的文化竞争外，这次世界博览会的特点在于种类繁多的科学产品，包括有声百科全书、电子字典、经过巴氏消毒法处理的奶酪、可在数秒钟内传输数百万字符的磁带以及可以在 15 分钟内检索一千张支票的邮政机器。最令游客印象深刻的是为了宣传本国经济发展而主办这次世博会的比利时展出的标志性展品：这是一个原子球状的巨型未来派建筑，它强调了原子时代的积极方面；此外还有其巧克力，在 58 世博会期间，比利时每天生产的巧克力达五吨。

尼克松在中国：世界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沃伦·科恩(Warren I. Cohen)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实现稳定和繁荣，能够保持自己境内的和平，并且强大到不会招致外来侵略，都将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其他国家。我们衷心希望看到中国进步，我们将尽我们所能，通过和平与正当的途径来尽力推动这一进步"。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908年12月对中国代表的讲话。

沃伦·科恩是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杰出历史学教授和"总统研究教授"，同时兼任设在华盛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亚洲项目资深学者。他的研究领域是美国外交关系和美国与东亚关系以及中国及周边地区历史。

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中国内战中取得胜利，对美国产生了极大震撼。在20世纪上半叶，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开始的美国决策者，均主张推动中国的强大和繁荣。他们认为中国会成为美国的友邦。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人在中国广泛开展慈善活动，例如在中国创办基督教学院，为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开了先河。再如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为乡村建设项目和培养中国一流医生的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提供了资金。很多美国人认为，自从美国政府向欧洲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照会"(Open Door Notes)——当时中华民族的生存存在1899年和1900年受到威胁——美国一直支持中国反抗日本和欧洲列强的事业。而最明显的是，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领导了将中国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的斗争。



1972年2月26日，尼克松总统(右)和夫人(中间靠后)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杭州西湖的一座桥上漫步。
(美联社环球图片)

中美关系破裂

但是，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并不友好，与美国人一样对美国在中国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有认识的中国人不多。中国新的领导人毛泽东对美国人的意图持怀疑态度，在1946年6月曾下令发动反美运动。他指挥的军队对当时在中国的美国人进行骚扰。一位美国外交官员在上海遭到警察的殴打。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曾被软禁了一年。而两国关系最糟糕的时候是1950年10月，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试图击退入侵南韩的北韩军队时，中国共产党出兵干预。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和美国士兵在交战中身亡，所有有关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想法因此而消失。

在此后的 20 多年里，美国和中国互相将对方视为敌人。虽然两国外交官员偶而在国际会议上碰面，或有时举行大使级会谈，但双方都未曾表示过和解意愿。美国方面继续承认在大陆被打败而在台湾岛上勉强维持的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坚持谴责美帝国主义，并拒绝讨论除终止美国对蒋介石提供援助和保护台湾以外的任何议题。

在美国，中国的敌意、因冷战而更加恶化的国内反共浪潮以及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人展开的游说等一系列原因，导致决策者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未能与北京建立联系。确实，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 (Dwight Eisenhower) 提出孤立中国是一个错误，但华盛顿仍然利用其影响将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



1972 年 2 月 24 日，尼克松总统(中)和夫人帕特在北京附近游览长城时与一群中国公民合影。最右边是国务卿威廉·罗杰斯。
(美联社环球图片)

到 60 年代中期，由于认识到中苏两国分道扬镳，并由于对越南战争的失望而导致反共情绪得到缓和，美国对与中国关系的看法发生了转变。重要的学术界和政府领导人主张采取他们认为是更加现实的政策，即接受北京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并寻找与之合作的途径。他们主张奉行“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但是，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政府在越南战争的泥沼里陷得太深，而中国人则淹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因此在这一时期两国没有发展新关系。

紧张关系的缓和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副手、1960 年竞选总统未果的理查德·尼克松的反共立场和对中国的敌视是众人皆知的。1968 年，他当选总统，中美关系缓和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渺茫。但是尼克松同意国务院高级官员关于中国也许能帮助美国结束越战并帮助美国抗衡日益增长的苏联势力的判断。他认识到，美国公众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加上他本人有反共的名声，这使他能够谋求与中国取得和解。尼克松政府开始缓慢而谨慎地、以不给美国安全带来任何威胁的方式发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信号。

中国首屈一指的外交家周恩来也一直在为同样的目标努力，他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并通过巴基斯坦领导人转达了这一信息。他逐渐说服怀有疑虑的毛泽东，美国不再对中国构成威胁，而且可能还会有助于北京顶住苏联压力。1971 年，两国关系发生了突破性进展。

在 1971 年 2 月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尼克松谈到有必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对话。他提出以不牺牲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席位为前提，让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取得席位。过去，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承认和支持历来是恢复美国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关系的一个重大障碍。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坚持只能有一个中国，两人都不接受华盛顿两个中国——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的主张。但在 1971 年，尼克松和毛泽东均急于想利用对方，因此同意“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的折衷方案。事实上，由于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识到与北京改善关系的战略价值，他们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向毛泽东做出更大的让步。在反苏联的斗争中找到一个夥伴更加重要。

1971 年 7 月，公众了解到基辛格刚刚秘访中国归来。尼克松宣布，他以美国总统的身份接受了访问中国的邀请。同年 8 月和 9 月，美国在名义上支持台北保留其代表权的同时，第一次支持北京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席位。美国有关保留双重代表权的提案遭遇挫折，此提案因基辛格选择在这个时候前往北京而受到削弱。阿尔巴尼亚有关用北京取代台北的提案轻而易举地获得通过。这是美国经受过的外交失败中痛苦最小的一次。华盛顿向一个中国的政策迈进了一步。

总统访问

1972年2月，尼克松飞抵北京，与毛泽东举行了一次私人会晤。世界各地电视观众在看到尼克松观看共产党宣传色彩浓厚的中国芭蕾舞并为之热烈鼓掌时都为之震惊。这确实是焕然一新的尼克松和与中国开始的新关系。

在尼克松为期一周的访问结束时所发表的美中联合公报表明，使双方走到一起的显然是两国对苏联的抵制。两国有关反对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表态，不言而喻是谋求削弱莫斯科对该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台湾仍然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美国方面表示认识到中国有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的立场，但同时重申他们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对于中国要美国从台湾撤军的要求，尼克松表示确认美国从台湾全部撤军的最终目标，并保证将随着这个地区(越南)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在台湾的驻军。同时，他和基辛格谋求减轻北京对日本将取代美国对台湾岛施加影响的忧虑。他进一步向中国领导人保证，美国不会支持台湾独立，并保证在1972年再次当选总统后采取中国所希望看到的行动。

根据1954年签订的条约，美国必须保卫台湾。美国企业在台湾的投资达数百亿美元。民意测验显示，美国人民不愿意将台湾这个朋友加盟友丢给共产党。尽管如此，尼克松政府准备废弃与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同时希望台湾人民在短期内能够保卫自己，而长期则会找到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的方式。

关系正常化

1973年，中、美在两国首都互设“联络处”，此等机构除名称外无异于大使馆。但两国关系正常化因水门事件危机而推延，这场危机最终迫使尼克松不光彩地辞职。但是，尼克松的继任者也同样致力于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并终于在1979年初实现了这一目标。由基辛格于1971年开始的秘密交换有关苏联活动的军事情报的工作始终没有中断过。

尼克松向中国敞开大门使冷战时期的力量均势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默契联盟——其矛头针对显然正在日益兴起的苏联势力——缓解了中国人对苏联可能发动进攻的担心，同时使美国能够将军事力量集中在欧洲，而苏联则继续在东、西两面受敌，而且这两个敌手现在协力对付莫斯科。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苏联最终垮台和冷战结束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1979年，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前往北京，他在那里重复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8年所讲的话，以再次表明这样一个信念，即一个强大的——并且据信是友好的——中国对美国有益。

乒乓外交开创美中关系新纪元

特殊外交使者改变历史

1971年4月10日，九名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四名官员及其中二人的配偶在10名新闻记者的陪同下从香港跨越一座桥梁进入中国大陆，从而开启了“乒乓外交”的时代。那次为期八天的历程表明了华盛顿和北京希望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共同愿望。

周恩来总理于4月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美国客人。他在宴会上说：“你们开启了中美两国人民关系的新篇章。”他说：“我相信重新开始的友谊必定会得到我们两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就在同一天，美国取消了对中国长达20年之久的贸易禁运。1949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中美关系因此结束。蒋介石及其政府撤退到台湾避难；在共产党取得统治后的22年里，没有一个美国团体可以进入中国。

因此，1971年4月6日，在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受到中国乒乓球队的访问邀请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中国方面还主动承担了访问的全部费用。

从4月11日至4月17日，美国乒乓球队与中国乒乓球队举行了表演赛，参观了长城和颐和园，与中国学生和工人会晤，在中国一些主要城市参加社会活动。一年后，中国运动员访问了美国，为热情的美国观众举行了一系列“友谊第一”的表演赛。

此前，由于苏联的侵略行为，中美两国已经在悄悄举行会谈，谋求改善两国关系。1971年，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为两国复交两次秘密前往中国；在乒乓外交建立起良好意愿后，尼克松总统(Richard M. Nixon)于同年夏天宣布，他将于次年访问中国，开始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展开正式会谈。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成了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

¹ 美国乒乓球队于1971年4月16日在北京参加中美乒乓球队之间的讨论。中国队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
(美联社/环球图片)

² 中美乒乓球运动员1971年4月在北京举行表演赛前进行练习。
(©法新社)

³ 中国副总理李兰清(左)2001年3月1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右)打乒乓球。为庆祝美中划时代的“乒乓外交”30周年，中方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盛大招待会。
(©美联社/环球图片)

贸易和经济：美国外交政策的要素之一

马尔腾·佩雷布姆(Maarten L. Pereboom)

美国在二十世纪成为世界领袖，它一面继续在国外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一面基于其启蒙传统推广自由、民主和市场开放的理念，提出“自由贸易的自由国家最终会促进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

马尔腾·佩雷布姆是马里兰索尔兹伯里大学 (Salisbury University) 历史系主任。他专门从事美国外交关系、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及冷战的历史研究。

可以说，自美国独立以来，在影响美国外交关系的各种要素中，寻求经济机会是最根本的一项。虽然历史往往偏重富有戏剧性的军事事件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但美国人从建国初期就开始寻求进入世界市场，因此有“国旗跟随贸易”一说。

美国在二十世纪成为世界领袖，它一面继续在国外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一面基于其启蒙传统推广自由、民主和市场开放的理念，提出“自由贸易的自由国家最终会促进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

美国帮助将世界从纳粹德国种族主义的恶梦和苏维埃共产主义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但是，作为世界领袖所面临的复杂要求也对把经济作为构建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基本要素提出了难题。



美国人从建国初期就开始寻求进入世界市场，因此有“国旗跟随贸易”一说。1789年，时任国务卿的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曾经派遣南卡罗莱纳州庄园主德雷顿(Charles Drayton)前往越南寻找贸易机会。(Charles Willson Peale 绘制的杰弗逊肖像)

法兰西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关于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的谈判于1803年4月30日结束，当时的美国总统是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美联社环球图片)

历史学家布拉德福德·珀金斯(Bradford Perkins)把美国争取独立的斗争描述为恢复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努力，1750年以前北美的英国移民曾经在帝国统治的“善意忽视”下享有这种自由。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战争(1756-1763)一方面取缔了法国在北美的权力，另一方面也促使英国议会对其殖民地徵税。由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没有代表权，后者单方面决定徵税引发了独立战争。在整个战争中，美国人关注的始终是自己的经济利益。

坚信自由贸易

1776年，当奋起反抗的殖民地需要建立一个反英国的政治和军事联盟时，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提出的《标准条约》(Model Treaty)仅限于和法国建立贸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籍不具有任何意义，双方的自由贸易权充份得到尊重，一方贸易夥伴甚至可以与另一方贸易夥伴的交战敌国贸易。虽然这项条约从未生效，但是，有关自由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将创造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界这一源于启蒙运动的信念被奉为金科玉律。

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美国开始在一个仍为欧洲列强所统治的世界上追求经济机会。为了为法兰西自己的战争筹集资金，拿破伦提出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广阔的路易斯安那领地，这对美国来说是命运之神的垂青。但就在几年之后，美国试图用《禁运法》(Embargo Act)来对英国和法国之

间仍在发生的冲突施加影响，使这两个交战大国得不到美国贸易的好处，但这同时也剥夺了美国可能获得的同样好处。今天看来，此举仍然是美国外交关系史上的重大错误之一，它还是导致 1812 年战争的原因之一，这场战争于 1815 年以僵持的局面告终。

在 1820 年代，欧洲在拿破仑失败后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许多国家纷纷获得独立，美国则以更具自信的姿态活跃于世界舞台上。1823 年《门罗宣言》(Monroe Doctrine)问世，美国宣布西半球不再接受欧洲进一步的殖民化。

然而，欧洲人继续对美国投资，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资源也对美国构成一种强大的诱惑。一方面，美国公司在采矿和农业领域积极拓展，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依赖外交政策和武装力量确保当地政府继续以友好的态度对待美国公司在当地的经济活动。

与此同时，对经济机会的憧憬以及对"天命昭示"的信念促使美国人向西部迁徙，美国也因此高速扩展。为了扫清道路，美国政府把印第安人赶出家园，发动了对墨西哥的战争，并与英国进行谈判，将美国的边界一直扩大到太平洋海岸。

跨太平洋通商

但是，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冲突限制了向北或向南的进一步扩展；到 1865 年内战结束时，亚伯拉罕·林肯总统(Abraham Lincoln)的国务卿威廉·苏厄德(William Seward)已经提出了以扩大商务而不是扩展领土为主的远景发展规划。横亘在太平洋彼岸的便是巨大的亚洲市场。虽然 1867 年从俄国人手中收购阿拉斯加一事被称为"苏厄德的蠢举"(Seward's Folly)，但它其实是保障美国与远东贸易通路的有见地的战略之举。在二十世纪初，从英国到日本等帝国列强图谋在中国进行殖民扩张，但美国不希望中国被瓜分，造成类似于 1880 年代"争夺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的情形，因此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Open Door)，以便保留进入中国巨大潜在市场的通道。门户开放政策主张所有国家的国民在某一领土享有同等经营工商业的权利。

在外交政策继续促进开放世界市场的同时，美国在内战后惊人的经济增长大多是在其境内发生的。像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安德鲁·卡内基 (Andrew Carnegie)等人通过经营石油和钢铁聚积起巨额财富，他们主宰了这些行业的兼并和扩展，使之发展为垄断或接近垄断的行业。公司制度这一美国创新使企业得以具有庞大规模，为美国经济势力在二十世纪向全球扩展打下了基础。

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指出，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其制造业占世界的近三分之一，而德国和英国分别占大约 15%和 14%。德国和奥地利向协约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宣战，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则宣布"在思想和行动上"实行中立政策。对中立的界定(或：定义)与亚当斯的标准计划条约互为呼应：即建立不受政治环境影响的自由贸易。由于英国设置的障碍，因此(美国)对德国的贸易下降到几乎为零的水平。美国对协约国迅速增长的贸易大大超过了对德国贸易的损失，因此美国未对英国设置的障碍提出挑战。尽管德国在东方战线上对俄国取得了胜利，但是到 1916 年，美国通过工业品和金融服务对协约国提供的经济支持在西线上对德国构成战败的威胁。德国对美国的中立立场提出挑衅，用潜艇对美国海运进行袭击，美国于是在 1917 年 4 月向德国宣战，与协约国一起在随后一年里战败了德国。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波特曼(Robert Portman)2006年1月28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有关贸易自由化的重要谈判期间发表讲话。
(美联社/环球图片)

2006年3月6日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了2006年能源周开幕仪式，图为乌干达能源部长塞达·布姆巴(Syda Bbumba)在仪式上发表主旨讲话后，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维茨(Paul Wolfowitz, 右)向她致敬。
(© 美联社/环球图片)

没有眼泪的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但纽约已在此之前已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在大西洋彼岸竞争对手的经济步履维艰之时，美国经济则蓬勃发展。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关于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和自由贸易的世界的构想对相互竞争的各欧洲帝国的旧秩序提出了挑战，但在战后世界美国和海外的政治态势中，这一构想未能得以实现。历史学家沃伦·科恩(Warren Cohen)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选择了“没有眼泪的帝国”(empire without tears)的外交政策：以最低限度的武力和政治承诺占有世界市场。在1930年代，持孤立主义立场的政治人士认为介入战争是个错误，是受想要发战争横财的军火商驱使的结果。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保持中立的法案，以确保美国不会因为贸易而再次卷入战争。

“没有眼泪的帝国”令人想到在大不列颠不那么严密的注视下的殖民繁荣时期轻松愉快的日子。但是在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统治的世界上，这种仁慈的忽视行不通了。在18世纪后期，乔治·华盛顿总统(George Washington)曾告诫美国这个新兴的共和国不要介入欧洲帝国的战争，但是现在，美国拥有了植根于美国经济力量的威力，确保野心勃勃的帝国不会挑战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尽管孤立主义的幽灵在美国迟迟不散，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在1939年1月宣布美国和平时期最大的防卫预算。1941年3月，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几个月前，美国通过了《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誓言要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来摧毁轴心国(Axis Powers)。同年夏天，德国潜水艇再次未经宣战地在大西洋对美国的利益进行挑战。

超级大国的兴起

1945年，美国、大不列颠帝国和苏联结成的特殊的(或：不寻常的)联盟击败了轴心国。苏联有驱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入侵和摧毁德国武装力量所需的人力和决心；美国则成功地调动起其巨大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大陆上所展开的最大的一次战争中赢得了胜利。而随着欧洲走向下坡，美国 and 苏联成了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但是，超级大国也代表了两种相互对抗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而双方进行的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核武器的发展，使随后而至的冷战具有了一种末日临头(浩劫在即)、共同毁灭(或：同归于尽)的意义。

苏联的威胁使美国不能放弃其在全球发挥的政治和军事作用。经济仍然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美国外交关系史上一个真正的天才之举是，美国在1948年至1951年间通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为各欧洲经济体提供了12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为有着迫切需要的国家提供援助，帮助它们挡住了共产主义的侵蚀；但西欧出现的巨大经济增长还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发展，也使

美国的慷慨赠予成为极具远见的投资。虽然美国人及其政府免不了会受保护主义的影响，但是作为全球市场的守护者，美国一般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以来支持全球市场的发展。一般来说，冷战政治带上了其自身的特色(或：自成一格)。虽然冷战的目的是维护全球经济体系，但它也导致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存在和(建立)艾森豪威尔总统所称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以支持其军事存在。例如，遏制政策把越南当作多米诺骨牌，它一旦倒向共产主义，就会在东南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美国为谋求建立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生命代价，但却以失败而告终。

冷战提出的挑战也给苏联及其盟国带来了巨大经济压力，其共产主义体系最终未能创造维持竞争所需的财富，更不用说保障本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安全的环境，或者适当的生活水平。随着共产主义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的崩溃，美国兴起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资本主义体系——它虽比掠夺大亨时期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管，但却有自身的弊病和受害者——得以在美国通行。冷战的结束虽未导致战略思想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揭示的“历史的终结”，但是，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的纷繁复杂再次向美国提出了挑战，这就是，阐明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及研究过去以便理性地处理当前的事务并提出未来发展的前景。

冷战之后

沃尔特·拉克(Walter Laqueur)

"历史表明，恐怖主义只能在自由或相对自由的社会活动。在纳粹德国或在斯大林统治的俄罗斯不存在恐怖主义；甚至在不那么严厉的专制统治的社会里也不曾有恐怖主义。但是，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听凭恐怖主义胡作非为，使之成为令人棘手的问题，那么，为了制止恐怖主义就得付出使自由和人权受到限制的代价。"

沃尔特·拉克 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研究理事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担任共同主席。他是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和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教授，并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特拉维夫大学(University of Tel Aviv)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担任客座教授。

冷战于 1989 年以柏林墙的倒塌而宣告结束，东欧各国重新获得独立，苏联最终解体，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和平终于来临。他们不再为可能发生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战争而担忧。一位很有影响的政治学家写了一部题为《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的书；当然，作者并不是说历史停止了，而是说国与国之间的重大冲突不再存在，在某些关键事务上全球达成了共识。

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可惜好景不长。怀疑论者(包括作者本人)认为世界上仍存在许多冲突，它们不过因冷战而被淡化或掩盖罢了。换言之，只要美、苏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继续存在，在当时显得较为次要的其他各种冲突就不会暴露出来。然而，似乎违反常理的是，冷战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维护世界秩序的作用，是一个稳定因素。

另外，发生一场新的、可怕的世界大战的估计当时可能被过份夸大了。正是因为有巨大的毁灭性武器存在，因此便有恐怖的平衡和相互威慑。由于冲突双方保持理性——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一场战争的后果是什么——因此保住了和平。

冷战结束后这样的相互威慑是否继续存在呢？或者新时代是否会出现大动乱？冷战没有终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但它毫无疑问延缓了这些武器的扩散。但是，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而今天面临的危险不仅仅是会增加几个核国家。

而真正的威胁在于少数国家获得这些武器后，其他国家会步其后尘，因为这些邻国会感受到威胁。另外，我们是否仍然可以假设那些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会像冷战双方那样保持理性呢？换言之，它们是否会因为受到宗教或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上的极端情绪的驱使而忘记使用这些武器可能导致自我毁灭的风险？或者它们会使自己相信它们可以对敌人使用这些武器而不会受到惩罚，并且借助于一场代理人战争而藏匿劣迹？



1992年5月2日，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 左)和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里根的德尔谢洛牧场(Rancho Del Cielo)会晤期间互相展示他们的牛仔帽。牧场占地 688 英亩，距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 30 英里的地方。
(©美联社/环球图片)

角逐领导地位

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在近年来逐渐显现，并变得越来越尖锐。没有仲裁者、没有最终权威来解决冲突。联合国本应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并不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更有能耐。联合国有近 200 个成员国，这些国家或大或小，或实行民主或实行专制，或介于二者之间，形形色色无所不包。有些成员尊重人权，有些不尊重。它们各有相互冲突的利益，使得联合国缺乏在危机中进行干预的军事能力。它们有时能够推动达成协议的谈判，有时在外交努力失败时则无能为力。

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意味着它对世界和平担负着重大责任。没有任何别的国家曾经处于类似地位——不仅要维护其自身安全，还要应对全世界所面临的威胁。但是，就连一个超级大国也不是无所不能，它行使其国际义务的能力有限。它不能也不应单独行动，而应该在国际行动中充当领袖，尽量通过说理争取合作，而只在必要时使用压力。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偕夫人柳德米拉·普京(Lyudmila Putin)(中)于 2001 年 11 月 14 日抵达位于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的布什牧场，受到布什总统和夫人劳拉欢迎。
(©美联社/环球图片)

然而，超级大国从来就不受欢迎，罗马帝国及其前后的所有帝国历来如此。不仅其邻国，较弱小的国家对超级大国也感到惧怕和怀疑。这是无法摆脱的困境。无论超级大国的行为怎样合理合宜，总会有人担心超级大国会突然改变想法和行为。较小的国家往往会联合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领导。超级大国无论尽多大的努力，但它除了放弃其权力外，没有赢得人心的灵丹妙药。超级大国一旦不再那么强大，其受欢迎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但历史上很少有超级大国主动选择这条道路。

随着冷战结束，新的权力中心开始出现，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进步，即使在十年前这种成就也难以想象。但是，目前它们还没有表明想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角色的意图。它们是地区大国，将来无疑会更加强大，但这可能会在多年以后，而在此期间，它们尚未表示急于承担起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

在冷战结束之后，有一段时间欧洲看来会与美国一道——即使并非总是与美国步调一致——发挥这一作用。一些政治观察人士声称，二十一世纪将是欧洲的世纪，这主要是因为欧洲模式一直很具吸引力，因此会被世界其他国家效仿。这意味着欧洲是非军事的和道德上的超级大国。

这些乐观的看法最近已不再流行。确实，欧洲可向人类奉献很多，而且 1948 年以来欧洲统一运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然而，在共同市场建立以后，这一运动便失去了势头，就连经济的运行也不如原来理想。欧洲的经济增长不足以提供建立欧洲大陆引以为荣的福利制度所需的资金。很多新成员加入了欧盟，但欧洲没有统一的外交政策，更不用说军事能力了。

多年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为欧洲提供了保护，现在依然如此。许多人认为，北约不再存在的理由，至少部份如此，因为导致北约产生的理由——即欧洲面临的威胁——已经消失。但是，如果旧的威胁消失了，新的威胁就会取而代之。

至于对北约持怀疑态度的人，如果他们曾做出努力建立自身的防卫组织，那么其说服力可能更大，但他们没有这么做。所有这一切，加上欧洲人口的弱势——即人口减少和老龄化——都反映了欧洲的衰弱。欧洲独立的外交举措——如对中东的外交——都以失败告终，而当巴尔干半岛上的血腥内战在

自家门前爆发时，事实证明欧洲在没有外来援助时对那场战争无能为力。作为一种理想，道德超级大国尽管令人向往，但它的时代显然尚未到来。

很少有人认为现在是废除警察和其他国内安全武装的时候了，但在国际领域，许多人的行为方式似乎表明根本不需要由武装力量来维持秩序，而这是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其所能造成的破坏和伤亡比过去更为严重的时候。

紧张局势与恐怖主义

很少有国家志愿充当世界警察——不可否认，这是一件没有什么吸引力、没有酬劳、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许没有必要这样做，也许国际秩序最终能够自我保护？

或许是这样。但纵观世界局势，我们没有理由过于乐观。俄罗斯尚未接受它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由于帝国的消亡，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怨愤，即归罪于各种外部因素，有些人则梦想着恢复旧日的势力和荣光。

在非洲，国际社会未能制止造成数百万人丧生的可怖内战。

中东尤其令人忧虑，紧张局势不断，国内国际恐怖主义丛生。恐怖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新的现象，它同高山一样古老。它以多种形式和面目出现，包括受极左和极右的激进主义煽动的民族分裂主义。但是，受到宗教和民族狂热驱使、在体制瘫痪的国家展开活动、有时受到某些政府的纵容、资助和操纵的当代恐怖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

关于恐怖主义的根源有很多错误的认识。一个常见的论点是，贫困和压迫是最主要的原因。一旦消除了贫困和压迫，恐怖主义就会消失。但是，恐怖主义并没有在最贫困的国家出现，民族冲突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假设两个民族都对同一片领土提出主权要求，都不愿做出妥协，那该怎么办呢？

当然，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恐怖主义获得胜利。历史表明，恐怖主义只能在自由，或相对自由的社会中运行。在纳粹德国或斯大林的俄国没有恐怖主义；甚至在不那么严厉的专制统治的社会中也不曾有恐怖主义。但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听凭恐怖主义胡作非为，使之成为令人棘手的问题，那么为了制止它所付出的代价就是限制自由和人权。自然，自由社会是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大难题，迄今还没有人找到一个解决办法。